

康定锅庄：汉藏经济贸易与民族融合的载体

□ 冯钰伟

康定（旧称“打箭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自明清以来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我国川茶销藏及汉藏民族贸易往来的核心集散地，吸引了众多汉藏商民云集于此。康定锅庄是伴随汉藏民族贸易兴盛而衍生出的一种地方性经济组织与文化空间，其融合旅店、货栈、贸易中介、衙门等功能于一身，在串联汉藏民族贸易，促进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定锅庄的起源与兴衰

“锅庄”通常被认为是由藏语“古喀”（skra-drag）音译而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有所不同。早期指土司下属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贵族和头人，随着汉藏民族贸易兴盛，锅庄的经济职能不断凸显，成为汉藏民族之间重要的商贸组织。根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土司锡拉扎克被藏蕃昌则集然杀害，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贡嘎袭职其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锅庄”。康定早期的锅庄系统规模较小，仅有4家，但却是明正土司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司制度下的头人、家臣、贵族等权力阶层作为锅庄主，承担着辅佐土司分担差务的重要职能。其中，接待往来汉藏使节朝贡觐见，并代为开展商业贸易便是一项重要任务，这也为康定锅庄日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康定锅庄产业的快速发展源于汉藏茶叶贸易的繁盛。在清朝以前，汉藏贸易主要集中在大渡河以东的冷边、冷村等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批准“行打箭炉（康定）市，蕃人市茶贸易”，汉藏茶叶贸易市场逐渐由大渡河东岸向西岸转移，康定则取代冷边、冷村等地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镇，大量汉藏商贾云集于此集散茶叶等各类商

品货物。在此背景下，康定锅庄的政治职能逐渐弱化，开始朝着专门面向汉藏贸易的经济实体结构进行转化，成为沟通汉藏民族贸易的重要枢纽。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定的锅庄系统规模发展至13家，到清中后期达到鼎盛，形成了48家锅庄的盛况，将汉藏民族的贸易往来编织进同一个贸易网络中。

清末，为进一步巩固边疆稳定，清政府实施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日渐衰微，康定锅庄也随即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治体制。进入民国后，长期的政局动荡使汉藏贸易受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政府又废除边茶引岸制度，康定在汉藏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减弱，康定锅庄也进一步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川藏之间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在1954年，川藏公路全线贯通，使康定曾经在交通意义上的核心功能迅速消失，康定锅庄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汉藏民族贸易的重要中介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沟通汉藏贸易的重要桥梁。康定锅庄除了为交易双方提供食宿、存储等服务外，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一套适应跨民族贸易需求的信任与沟通机制。在汉藏贸易往来中，汉族和藏族之间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为了克服这些族际通商的障碍，康定锅庄作为中介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营锅庄的锅庄主，作为整个交易链中的核心人物，既通晓汉藏两地语言，又深谙汉藏两族的经商理念与文化习惯，同时又可敏锐洞察商品市场的行情，在交易过程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锅庄主的牵线、介绍与担保，有效打破了汉藏民族之间因语言和文化存在的隔阂，弥合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通商壁垒，促成了双方交易的顺利完成。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汉藏贸易交往的重要集散地。在建筑形态上，康定锅庄从早期“番民垒碉”式的多层结构，逐渐发展为融合汉藏特色的四合院风格，这种布局巧妙结合了汉式天井与藏式院坝，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空间。锅庄的院落也是进行商品打包、分装、存储、交易等活动的场所，来自西藏的兽皮、金银、麝香、虫草、鹿茸等特产，与来自内地的茶叶、布匹、棉花、染料等物资在此汇聚和流转。这种活跃的商贸不仅满足了汉藏双边的需求，更直接带动了农牧业、缝茶业、制革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围绕锅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贸易体系。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汉藏贸易协作的社会交往空间。参与贸易的交易者，既有贵族、使节、商贾，也广泛包含了社会底层的驮脚娃（背夫）、客夫子（伙计）、农牧民以及从事贸易的零散商贩。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群在此频繁互动、协作交流，使康定锅庄超越了单纯的交易场所，成为既是汉藏物质文化交汇之节点，又成为建构汉藏民族乃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融合共生的社会交往空间。

汉藏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

康定锅庄是汉藏民族相互尊重、团结友好的象征与纽带，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汉藏民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构建了和谐发展、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汉藏民族借助锅庄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外来的汉族商人不仅尊重藏族民众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更是以“入乡随俗”的智慧主动适应藏族社会，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效仿藏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他们将商贸活动巧妙地融入藏族民众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之中，获得了藏族民众的广泛认同。藏族民众则在相处中学习汉族语言与文

化，吸收汉地商业理念。康定锅庄作为中介组织，主动进行双向调适，采用汉藏双名的方式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融、情感交融的媒介。例如，康定锅庄系统中最大的“瓦斯碉”锅庄取汉名为包家锅庄，“下必崇”锅庄称为汪家锅庄，“色根古”锅庄称为罗家锅庄，“甲人色”锅庄称为木家锅庄，等等。

康定锅庄还促进了汉藏民族间以通婚为载体的民族融合。据《西康之种族情形》记载，“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者，亦多娶夷女辅助”。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了稳固客源，康定锅庄构建了跨民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以商人为主的汉族男丁入赘藏族妇女的汉藏通婚模式，俗称“坐锅庄”。此类跨族通婚兼具情感联结与商业协作的双重属性。首先，夫妻双方必须通过学习达到语言相通、情感相联的状态。其次，藏族妻子在掌握汉语后即成为兼通汉藏双语之人，可担任翻译促进交易完成。她们还因藏族身份更易获得参与贸易的藏族同胞信任，是贸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汉藏民族从生意伙伴转变为姻亲关系，子嗣承载两族血脉，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经济共生跃升至基因交融，为民族团结注入了血脉相连的韧性。

康定锅庄是汉藏民族经济交往的产物，也是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场域，生动体现了汉藏民族互动交融、互相接纳、互相借鉴的和谐关系。尽管康定锅庄最终因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社会需求的转变而逐渐消逝，但其所承载的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却弥足珍贵。



（上接1版）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具有天然的敏感性，能够将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可以有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活力和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推动其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的主体。

强化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主体地位。当前，在国家科技创新决策中，企业的参与范围、比例及话语权相对较弱，这是一块明显短板。要完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战略规划、重大项目及重大政策论证制定的决策机制，建立企业家常态化咨询制度，吸纳更多企业界科技专家进入国家科技专家库，提升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鼓励企业开展重大科技攻关研究，探索企业研发项目遴选机制，推动具有较高溢出效应的行业关键通用技术研究上升为国家项目，助力提高整体科技力量。

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的主体地位。当前，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77%，已成为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强化国有企业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作用，提升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制度，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技术研究。完善对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探索将研发补贴资金向有能力、有意愿开展研发的中小企业倾斜，在各领域打造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强化企业科研组织的主体地位。企业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在新方法提出、新科研范式形成、新领域研究、新现象解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加大对科技领军企业、链主企业等龙头企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支持力度，推动企业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实施更多产业导向类创新项目，推动更多揭榜项目由企业提

出、更多技术需求由企业凝练、更多科技成果在企业转化。培育大中小微企业融通创新平台和基地，鼓励企业间建立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机制，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等主体协同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畅通融合发展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成果转化是衔接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孵化器”，更是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重要“关口”。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在30%左右，特别是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不足10%，大量科技成果仍然尘封在实验室里和书架上。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打通科技创新到产业应用通道，加快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机制。高校、科研院所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供给方，企业则是科技成果的重要需求方。当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供给与企业产业需求失衡，使得科技成果转化受到供给不到位和需求不充分的双重制约。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线上服务平台，整合科技成果、企业需求、转化政策等信息资源，推动开展“订单式”研发和“投放式”创新。深入推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常态化交流合作，办好科技成果路演推介、创新挑战赛等转化对接活动，推动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

健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近年来，随着以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极大消除了科研人员和管理者的顾虑，科技成果转化驶上“快车道”，但仍然存在分割确权难、考核机制不健全、转化效率低等问题。要完善分类评价机制，科学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产业化成果等评价标准，建立市场导向的科技

成果定价机制。完善激励机制，深化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等改革，积极探索“先确权后转化”“先使用后付费”等转化模式。完善尽职免责机制，明确尽职免责行为评判标准，鼓励第三方机构对尽职行为进行科学系统评价，形成支持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水平。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至关重要的“最后一公里”。要加快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大力培育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中介服务机构，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技术转移公司。完善技术经理人引进、培养、评价、激励等政策，建设一批特色化、专业化实训基地，加快建设高水平技术转移人才队伍。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及时将科技成果应用到产业发展主战场。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优化融合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还存在着不少堵点卡点，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衔接不够紧密，融合效能尚未得到充分释放。这就要求我们以改革解难题、激活力，推进平台、人才、资本等关键要素有效整合、创新配置，推动“四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一流创新生态。

统筹建设创新平台。创新平台是集聚创新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要围绕创新策源、产业培育、成果转化三个主要创新环节，统筹创新平台建设提升，更好以平台聚人才、集要素、汇资源。建强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构建“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地方实验室”的新型实验

室体系，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建强产业创新平台，以企业为主体统筹推进一批功能互补的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中试服务平台等，强化概念验证、技术熟化、工程化放大等功能，打通“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创新链条。建强功能服务平台，做强做优检验检测、计量测试、认证认可、知识产权等功能服务平台和科技服务机构，加快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企业成长全周期的立体化服务体系。

深化人才体制改革。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动力源泉，必须紧紧抓住人才这个根本性、关键性的资源，才能让科技创新的“种子”在产业创新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有效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动力和活力。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统筹推进高层次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队伍，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强化金融服务保障。金融是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的催化剂。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应用、产业化，再到产生效益和投资回报，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要准确把握创新活动的特性，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点领域，推动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完善科技担保、风险补偿、科创债券等政策，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形成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良好氛围。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创新授信模式、信贷产品，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金融服务。

（作者系四川省委常委，绵阳市委书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并肩作战，为人类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学术研究、媒体话语等方面长期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延续，西方的二战历史书写与传播逐渐产生严重的历史真相偏差，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不少西方学者通过选择性记忆、价值模糊化和叙事重构等隐藏手段，解构二战历史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具体表现为：以西方中心主义重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贬低东方战场战略价值、夸大西方贡献，并以现实政治需求重构历史评价标准。这对全球二战的集体历史记忆构成了严峻挑战，我们要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在二战史研究中的盛行。

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历史叙事偏差长期存在。西方历史虚无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出发点构建二战叙事，强调欧洲战场和英美国家的主导作用，淡化甚至否认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在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实际贡献。二战起点界定的政治性选择是西方中心主义最显著的体现。西方主流历史叙事将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作为二战起点，这种起点界定方式完全抹杀了中国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壮烈历程，也无视埃塞俄比亚1935年抗击意大利侵略的早期反法西斯斗争。战争叙事框架的欧洲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集中表现。美国总统罗斯福首次提出“二战”概念时，刻意将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赋予这场战争以欧美为中心的“道德连续性”。西方学界强调二战与一战的历史连续性，却忽视其全球反殖民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维度。西方主流叙事中极少提及“慰安妇”、东南亚强制劳工、印度参战贡献等非西方视角，而是构建起以欧美为主角的叙事体系。

全球史叙事中的“东方战场边缘论”成为突出问题。近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学界成为一种趋势，试图以跨国视角重新构建历史叙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方战场尤其是中国抗战的角色，仍旧被边缘化、低估甚至歪曲。“中国战场配角论”“抗战被动论”“中细印战场是太平洋战场的附属”等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屡见不鲜。西方学界所谓主流观点错误地认为，中国在抗战中的贡献是间接的，主要表现为通过与日本的消耗战拖住了日军，损耗了其资源，从而间接帮助美国及其他盟友取得胜利，对于改变战局的影响有限。这些错误论断完全无视中国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历史事实，忽视中国长期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战略意义。这种将中国战场简单地归类为“边缘”的论调，削弱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独立参与者与决定性力量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对中国贡献和中国人民所作牺牲的歪曲和抹杀，本质上是对历史正义的无视与掠夺。“东方战场边缘论”的根本危害在于，它割裂了二战作为全球性冲突的整体性，抹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多中心性质。

意识形态主导的欧美“解放者叙事”传播广泛。随着冷战格局确立，意识形态分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对二战历史的书写。在这种背景下，所谓“解放者叙事”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历史叙事的主线之一。这一叙事将英美等西方国家塑造成“正义的化身”“欧洲的解放者”，并且通过影视作品等强调其在诺曼底登陆、解放法国、击溃纳粹德国等行动中的英雄主义角色。对比之下，苏联在东线战场的决定性贡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被刻意地系统性忽略。冷战意识形

清醒认识西方二战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 刘本森

态使西方叙事长期贬低苏联的战争贡献，将斯大林格勒战役等关键战役边缘化，同时夸大西线战场如诺曼底登陆的作用。西方主流叙事将中国抗战简化为“等待外部救援的被动抵抗”，无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预见、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主动出击、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重大贡献等史实，贬低中国抗战的自主性和战略价值。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这种叙事策略，不仅贬低了中苏等国的历史贡献，更建构起错误的二战价值体系——将一场人类正义力量共同对抗法西斯暴行的全球抗争，简化为西方国家拯救世界的英雄传奇。

选择性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大行其道。在西方二战研究与公共叙事中，选择性历史记忆和纪念活动日益凸显，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一方面，日本“受害者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正在悄然扩展。这类叙事通过颠倒战争责任、重构历史角色，模糊了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界限。比如有学者强调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的苦难，刻意回避日本侵略行为本身，将日本包装为“战争受害者”。另一方面，纪念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与片面性。西方学界对于二战的欧美历史记忆发掘较为深刻，高度聚焦诺曼底登陆等英美主导战役的纪念活动，对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表示漠视甚至抵制。

历史虚无主义在西方二战研究中的种种表现，绝非单纯的学术分歧，而是关乎人类集体记忆建构、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 and 世界和平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二战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中国学界应加强对抗战历史的深入研究与国际传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系统批驳西方二战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推动二战历史的全面教育，推动主流媒体、影视作品讲好中国抗战故事，强化国家记忆与公众历史自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有关识之士共同推动真实、公正、多元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构建，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记忆。

